

一部好作品，最可贵的是创新，打破旧有的均衡、冲出惯性的审美思维，破旧局、出新意，给人以独到的审美感受。读阿莹的长篇新作《长安》，我就感受到了这种“破局”之美。

第一个破局，是在当代文学工业题材长篇创作中破局。翻开小说，上世纪50年代积极蓬勃的社会面貌徐徐展开，那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所熟悉的“一五”时期，国家全面复苏，社会面貌和人的精神状态都充盈着生气。小说以“一五”计划作为开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如一些论者所言，作品以50万字的体量刻画了难得一见的军工场景、不可多得的角色文学人物及他们的事迹，书写了炮火连天下的爱恨交加、大山大处的世俗争斗，交织成一个时代的传奇，“好读耐读，不可不读”。是的，《长安》完全可以视为一部新中国工业化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它让你想起当年草明的《火车头》、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铁水奔流》、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等新中国初期的工业题材作品，知足珍贵地接续了反映新中国工业化这条文学脉络。

阿莹是陕西人，自小生活在西安一个国营军工厂社区，童年记忆让他与军工社区有了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作家将童年记忆和青春经历自如地融汇到作品的人物和环境之中，通过文学渠道，将作家的生活经验投射到军工人的现实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人生记忆和生命体验，让作品从字里行间散发出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温馨，像春天新翻的土地在阳光下冒出腥冽的气息。作者曾担任过军工企业的行政职务，改革开放后还参与过更大范围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经历都在作家的书写中默默发酵，个人的生命体验一一转化为作品的艺术经验。真切和真诚生发美，真诚的倾吐是文学审美中的重要一环，作家意识到并抓住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

小说的“破局”之处还在于，它不但接续了描绘新中国工业化的创作脉络，更以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垫底，“破局”先行，以审美方式重塑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进一步揭示了共和国新兴的军工企业体系走向改革开放、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作品尽管没有正面展开工业战线的改革开放画卷，但小说在结尾处对“计划”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的反思，以及忽大年从秦岭靶场返回工厂后对自己命运的未知，已然客观表现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物的焦虑和苦闷也是时代的苦闷，是军工大厂、军工人的苦闷，是那代人渴望创造革新的生命冲动。作者的这种认识远远超出了故事发生时代的认知水平，极具动态感和现实性。

回顾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创作，大致是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线中逐步深化发展。上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题材创作是一个阶段，可称之为“初创期”。改革开放伊始，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和张洁

乌蒙山片区是全国14个扶贫连片地区之一，也是自然资源部牵头的部际联系单位。采访乌蒙山及其连片地区脱贫攻坚，是中国自然资源部交给我的创作任务。

离开北京那天我很激动，一大早拿着采访函准备出发。我从自然资源部办公室出来，沿羊肉局回东去，经过西四地铁向南，到正阳书局去归还早已借阅的北京胡同系列丛书和《金粉世家》。

正阳书局听起来很大，其实地方很小，给人以沧桑和精致的历史感。北边第一间正房墙上有一幅标图，标着鲁迅和张恨水在砖塔胡同住过的地方。沿砖塔胡同西去，可以找到张恨水的故居，这是一处很破旧的四合院，在砖塔胡同最西头，用黑漆写着64号。小门楼，黑漆木板大门，随时都可能倒塌。据说鲁迅和周作人闹矛盾后在这里租了房子，只住了两年，就去阜成门大街北边买了那个后来作为鲁迅纪念馆的四合院。

似乎转了个圈，我又转到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和砖塔胡同之间有好几棵几百年的老槐树，它们都有身份，树枝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树龄，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油画家写生者。健壮挺拔的槐树傲然耸立在路旁，顶部的树枝自由伸展，嫩黄娇绿的叶子密密匝匝，养人的眼。

从树影里走出来，就走在了阜成门内大街上。阜成门大街被老舍写成了北京最美的大街，说是一街看尽700年。从阜成门桥由西向东走，西北方向就是鲁迅纪念馆。往东看，不远处居民区中突然耸起蒙元皇室敕建藏传佛教寺庙白塔寺，这是北京城唯一一处完整的元朝真迹，也是一条街看尽700年的见证。再往东走是历代帝王庙、广济寺，广济寺对面就是自然资源部。

回到报社门口，我远远看到陈国栋社长走过来，他当时是报社社长，也是中国自然资源部协理主席。我随他散步，他走得很快，边走边和我们商量写作的事。陈社长对国内新闻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在新疆写了篇散文，是关于为修天山公路而牺牲的烈士家属的事，叫《乔尔玛哑口那座丰碑》，引起新疆有关部门关注，解决烈士家属去新疆守护烈士陵园没有住处的问题。他工作头绪繁多，每期报纸都要把关，挤时间写作，往往晚上10点多离开单位，早上6点多准时到单位，每天写作至少半个小时。

陈社长曾和报社的班子成员多次讨论到乌蒙山采访的事。陈社长说：“这是个重大题材，一定要好好采访，扶贫就如上战

《长安》的“破局”

——评阿莹长篇小说《长安》 □肖云儒

《沉重的翅膀》为代表，是极有力度的“另起一段”。此后不久，工业题材作品大幅度超越题材界面，深度融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和人性思考之中，融进了“问题小说”“都市小说”“市场经济生活小说”之中，其独立性几乎消融了。这其实是工业题材创作对传统行业题材的一次大的拓展和深化，或可称之为“外溢”期，是一次“外溢”式的掘进和发展。但工业化进程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文学在再现这一部分时出现了缺失。《长安》和阿莹的另一部军工题材话剧作品《红箭，红箭》是对这种缺失的回应，是工业题材在“外溢”后的一种高层次回归。作品看似重回回到工业题材本身，重又集中展开相当纯粹的工业社区生活，但其实是一次否定之否定，带有“破局”的意义。作家对现代工业社区生活的描写，其角度和深度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作家和作家笔下的人物、生活，都吮吸、浸润了新时代新的生长素，因而有了各自的新境界。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内生”式的发展期。

阿莹以自己的军工题材文学创作，较为完整集中地展示了我国工业题材创作由“初创”到“外溢”再到“内生”的阶段转变，反映了在一个甲子的历史发展中，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由传统计划经济到新的改革实践这一艰辛的创业史和曲折的发展史。随着生活画卷的展开，作者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命运遭际和人情冷暖，保存和展示了极具历史和审美价值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经验。读者为英雄赞歌所激励，而遗落在时代搏击中深处的余音和隐幽，又触动我们去思考，或引发会心的一笑。文学不应只是审美化的社会史，也是审美化的精神史、心灵史，用作品保存各个生活阶段的生存样态和心理经验，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责无旁贷。

回归工业题材，并不是将工业社区的生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剥离开来、封闭起来，那不符合生活现实，也不符合文学规律。文学视角下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是整个社会生活中人和事的有机构成，阿莹深谙个中道理。在《长安》人物谱系的构筑中，他让军工社区生活呈现出向社会生活全维度的网络状辐射，在这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作者追求“破局”的文学胆识。

小说集中细致地描写了忽大年一家和他的战友们命运的起落离散，将较为单纯的“小长安”的军工生活和那个年代“大长安”的城市风云乃至整个社会、国内外局势的大变动贯通一体，作了立体的表达。

小说主人公忽大年和他战友的经历，使战争与和平两个时代融接一体。他们由

旧社会的掘墓人转变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这是两个历史阶段的辐射；他们将长安厂区的军工生活和长安古城的社会生活融接一体，这是一种小社会向大社会的辐射；他们将社会人和职业人融接一体，既具有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使我们感到熟悉和亲切，又有行业独有的心理和语汇，使我们感到陌生而新异，这又是一种多重身份感的辐射。

小说通过忽小月这个人物，将中国的军工生活、军工文化向域外的俄苏文化、世界文化辐射。时代的特殊环境造成了她人生的坎坷和感情的跌宕，最后甚至酿成生命断崖式的毁灭而止。在相对闭塞的1960年代，这实在是一条罕有的、又极需勇气才能建构的生活和文化通道。

连福，一位东北籍的专业技术人员，却对历史文物分外钟情。这种文化情怀，使他与长安古都有了深切的精神关联，既将现代科技的军工业和长安这块土地深厚的历史文化融接到了一起，也成为忽小月钟情于他的一个文化因素。这个人物的设计，将幽远的城市文脉、人物的职业身份和自身最隐秘的感情生活融接起来。

我想多说几句黑妞。在文学画廊中，黑妞是个十分有新意、有寓意的形象。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工业文明的融接，构成了黑妞的人生轨迹。她以乡村传统伦理的姿态进入作品。战火纷飞的特殊环境，使她与新婚的忽大年离散，但她冲破一切环境和精神上的阻力，自东鲁西行至长安寻找心中的“他”。她并不想干扰对方现有的家庭，只是希望贴着、支持着、遥感着这个与自己有着联姻之缘的人。她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内涵，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了中国女性由传统农业文明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感受到了传统伦理亲情转变为革命战友情谊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妇女由传统的贤良忠厚转向军工人的责任担当的过程。黑妞身上凝聚了两段历史、两个时代。

最令人钦佩的人物（忽大年），最凄美的人物（忽小月），最能在灰色人生中发光的人物（连福），最复杂而酸楚的人物（黑妞）……人物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结晶，以上种种辐射性的人物布局图，使作品有了极大的社会视野和历史纵深。作者将一系列人物写得熟稔如故人，却又陌生若新知，通过构建这些关键人物的网络，使得具有军工特质的特殊人生和生存场与社会大众的人生和生存场相交叠，既写出了军工社区的日常生活，又凸显了他们在军工业中闪耀的光彩。这种光彩，由战争年代

不怕牺牲的血性，到和平年代自力更生的骨气，再到军工业生产科学工匠精神，三位一体，迎面而来。在艺术审美的坐标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更是感情关系、亲情关系、情绪关系的总和。作者从这个层面展开笔墨，可谓棋高一着。这一组丰满、罕见的军工人群像，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的一大收获，具有开先河的“破局”意义。

第三个“破局”，是小说以军工生活作为基点，侧面描写了在朝鲜战争之后，新中国所经历的三次战争：1958年台湾海峡的金门炮战、1959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1969年中苏边境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作者抓住军工生产能够辐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生活走向的特殊优势，对三次战争作了延展性展示，发掘出军工生产和军事斗争的固有联系，也使作品具有国际国内的大视野，极大拓展了小说格局。一部小说贵说三次战争，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一次“破局”之举。

从作品内容和构思的实际需求出发，小说对三场战争的描写并未正面展开，而是围绕军工生产和人物塑造的需要，撷取吉光片羽作点式描绘。用军工人的事业和生活，将国家整体生活的大走向自然地牵引出来，让战争与战斗精神与人物的性格命运实现了无缝衔接。

中印自卫反击战前线急需新型炮弹，为尽快试验成功，已经被正式宣布“靠边站”而不再履行厂长职责的忽大年，奔赴中印前线“拆哑炮”，军工工人那种勇毅献身的精神何等撼人心魄！忽大年带着独生儿子忽子鹿去珍宝岛实战中试验反坦克火箭的威力，父亲举荐儿子作第一试验射手，将自己的亲人推向最危险的岗位，又是何等大义凛然！忽小月与俄苏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命运在中苏关系敏感期无端又无助的起落，令人何等揪心！连福一行人去东南前线送弹药搞测试的那段艰苦而又逍遥的生活，又是何等新颖独特！

战争不但是国家力量、民族精神的锻锤，也会给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在精神和性格上淬火。小说展示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在军工生产和军事斗争中逐级升华的过程。为了民族安危和国家强大，他们践行军工报国的信念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在社会风浪中，他们喷薄着英雄主义的血性、工人阶级的骨气、抡拳投锤高峰的豪气；在生命大道上，他们止戈为武、以强致和，以军事实力求天下太平。中国军工人的精神境界由此得到了一层深于一层的开掘展现，这种展现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审美重构和文学叙事得到实现的。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匍匐的民族，不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民族是萎靡的民族。《长安》高扬血性、骨气的英雄主义精神，给文坛吹来了力度强劲的崇高审美之风。小说《长安》又一次告诉我们，探索永远是创作不竭的源泉，创新永远是创作不变的追求，“破局”“开局”永远考验着作家的勇气和智慧。

扶贫赣州，沿着扶贫之路已走过了30多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扶贫开发的中心工作。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赤水丹霞国家地质公园等的建设也成为乌蒙山脱贫攻坚新载体。

2012年2月，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工作在云南昭通启动。自然资源部先后在北京、贵州毕节和四川凉山召开三次片区部际联席会议。自然资源部把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工作列入部重点工作，部党组把它落实到司局，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帮扶措施。土地政策倾力扶持，土地整治、增减挂钩，才有利于脱贫攻坚，都要发挥最大作用，在人才和法律支持上更是不遗余力。2017年9月29日，第四次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部际联席会议召开。五年來，自然资源部认真履行牵头职责，片区脱贫用地指标得到较好保障，增减挂钩扶贫政策效益开始显现，土地整治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地质调查助力扶贫产业发展，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有了新的提升。

2019年9月24日，自然资源部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召开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部际联席会议，会议强调下一步工作要深刻领会党中央精神，牢牢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特别是“三保障”，并提出一系列要求。2020年7月30日以视频形式再次召开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对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最后冲刺阶段工作提出要求，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自然资源部连续9年定期召开会议，联合工作组走遍了10市38县，就“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持续深入调研。2021年10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自然资源部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关情况，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的又一个历史性成就。

我有幸用一支拙笔记录了乌蒙山腹地脱贫攻坚10年中的某个瞬间，记录了某个第一书记、某个乡村干部、某个贫困人员的只言片语，记录了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群众为战胜贫困、实现小康所表现出的奋斗精神，展现的是云山火海的沧桑巨变。瞬间能永恒，历久能弥坚，我坚信真实的力量坚不可摧。

我的采访从赫章县海雀村开始，也在海雀村结束，等于画了一个圆。“把生活过成理想”，我一边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边这样想。

一晃，我们《灯盏》书系的出版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

一件事情，让一群人坚持做四年，想来已无言地证明了这件事情的价值与意义。回望来时路，我们会记起四年前对原创频道投稿系统的创新性升级与改造；会记得三年前在集思广益下对“本周之星”栏目的创立；会记得两年前“年度文学之星”评选时的繁忙与郑重；更会记得一年前原创频道小说征文大赛启动时的激动与期盼……四年中，让我们铭记的事情有很多，但最让我们喜悦并自豪的是日益攀升的注册会员数量，是一本本《灯盏》的出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文友们的认可与鼓励。

我们之所以矢志不渝地坚持这项工作，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无穷的远方与无数个角落，闪烁着从未熄灭的文学之火与文明之光。无论在闹市还是边地，是在人群中还是独行者，他们个个满怀赤诚，在文学的篝火旁聚拢、取暖和明心见性。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与文学为伴，并将他们对世界的识见与生之遭际通过我们的网站发表，进而获得读者的阅读或反馈。源自心灵深处的热爱迸发出不竭的创作激情，这其中有很多人的名字经常会我们的网站页面中出现，而他们的作品也被我们的编辑所熟知并探讨。诚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固然在流动变化中，但同时文学的内在之核又是恒常不变的。我真切地感受到，在这些朋友的心中，文学始终纯粹、温暖，闪烁着迷人的光泽，充满着永恒的力量。文学如同一盏盏明亮的灯火照耀着他们的内心与生活。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中国作家网始终尽力推动全国文学内刊工作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职责。

为了守护文学的辉光，为了不辜负作者的创作热情，我们唯有不断努力和前行。四年來，《灯盏》书系的装帧、册数、字数以及选择文章的范围都有了较大改变，尤其是随着2020年初“本周之星”栏目的设立，《灯盏》主要收录那些入选“本周之星”的作品，它们都是每周由6位有着丰富经验的编辑从几千篇投稿中精心爬梳而来的作品，所以《灯盏》书系的副标题由“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变更为“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其中2020年度《灯盏》收录48位作者的优秀之作，分别为诗歌16首、散文23篇、小说9篇；2021年度《灯盏》收录47位作者的优秀篇章，分别是诗歌20首、散文13篇、小说14篇。之所以列出详细的数字和体裁类型，只是想告知朋友们，我们在这项工作中不断地吸取经验，通过加强编辑力量、设立文学奖项，以及经由征文大赛等方式进行引导与荐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投稿作品体裁单一、不够均衡的状况，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了原创作品的丰富与内在品质的提升。

循此路径，在2021年度《灯盏》所收录的47篇（首）文章中，既有名家力作，亦有新人佳作，内中许多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们感受到人世的旷远与精神的景深。杨帆的《蜗牛邮局》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偏僻小城，作者语言素朴细腻，直达人性幽微，传递出浓浓的旧时气息与风俗人情。张满昌的《深夜出击》塑造出一位深情而疼惜爱人的“暖男”形象，但却无法将所爱之人从深夜的加班中“拯救”出来，世俗生活的压力与人生的复杂况味令读者感同身受，唏嘘不已。这两篇作品在2021年中国作家网小说征文大赛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一、二等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年度的《灯盏》中，收录了李跃慧的《县长和我打老鬼》，她曾凭借《山歌好比春江水》一文荣获了去年小说征文大赛的一等奖。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坚定的善和乐观的信，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芸芸众生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困苦却始终坚韧、乐观，给人以温暖与力量。

每逢岁尾，中国作家协会约请专家学者对全年入选“本周之星”栏目的作品进行点评，并评审出年度“文学之星”的获奖名单。王建刚的《北漂的老人》以独特的题材与成熟的叙事荣登榜首。他将目光投向人们鲜少驻足的“北漂”老人群体，将他们的喜怒哀乐那移到文字中。经由作者的书写，我们得以窥见到那些为了子女后代的生活不得不远离家乡、侨寓在陌生都市中冷暖自知的老年人的大人生故事；西屏的《玻璃、废墟及其他》一诗冷峻、节制，诗人将沿河行走时所见的几个画面准确定格，呈现出一幅鲜活而又耐人寻味的水边画卷；扎西才让的《他们》中每个章节独立成篇，每章两三百字不等，诗中的人物带有浓郁的藏地气息，这些边地之子从远古的时空中迎面而来，在岁月的洗礼中体悟生命，叩问命运；吴彦非的《阮郎归》关注的是流动时代中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游荡的个体感怀与心灵悸动，作者将这类人群从纠缠挣扎到最终与自己和解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摹画出一幅当下时代有情有义的烟火画卷。此外，前进的孙的《我记住的树》显示出一个年轻写作者向内心掘进的智性表达。杨秀廷的《夏至：时间的拐角》将文字的美感恣意发挥到极致，是语言与情致兼具的佳作。刚杰·索木东的《重游（外二首）》好似如泣如诉的小提琴曲，弥漫着忧伤哀婉却又不肯颓靡的韧性的力量。任路的《给我一支烟》为英雄的逝去奏响了铿锵的颂歌，洋溢着朗健的气质和淋漓的元气。木俞的《关于苏茜（节选）》则以海外生活的深描显示出年轻作者对时代和生活的介入，显示出年轻作者的写作才情及未来可期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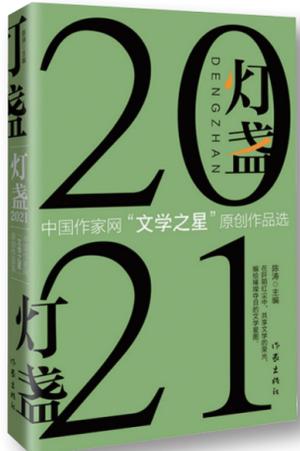
自然，优秀的作品还有很多，譬如董欣潘《秘药（组诗）》、野老《海浪哲学（外九首）》、林杰荣《海边行（组诗）》、双鱼《沂蒙旧事》、张毛豆《碗豆》、薛家河《胡家湾》、何晶《英语》等等。限于篇幅，更多的作家作品难以一一罗列，也未暇逐一点评，但这并不妨碍文本内在品质的精良，也不会遮蔽作家创作成果的展示。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诂”，未及展开的探讨空间留待读者们思索和品鉴。

毋庸置疑，《灯盏》所收录的作品是我们从成千上万篇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能够从数量如此之巨的稿件中脱颖而出，足见其艺术品质的优良。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些入选作品中，现实题材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充满想象力和讲究叙事技巧的文学作品却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乡土题材作品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文学的主舞台，而城市文学作品的数量则少之又少。在总结过去、放眼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明年的《灯盏》收录中，读者可以看到更多类型更为丰富、题材更为多元、叙事更为精巧、艺术更为圆熟的文学精品。

最后，祝愿所有的写作者不仅要去做苍茫大地上的灯盏，更要成为浩瀚天空中的明星，让我们在阡陌红尘中共享文学的荣光，编绘出璀璨夺目的文学星图。

——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序言》 □陈涛

大地的照亮或夜空的光芒



行走致敬

——《行走乌蒙》代后记 □周习

场，你想想，一群决策者围着一张地图，用红笔标出贫困村，调集兵力出击，那场面是多么壮观！”我答应着，也很激动。陈社长说，总书记号召精准扶贫以来，自然资源部积极落实，2016年提出“增减挂钩”支持扶贫开发异地扶贫搬迁的精准政策；部、省、市、县四级联动，让14个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制定专门扶持政策，开展扶贫专项督察等，加快推进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成为国家部委中精准扶贫工作的样板。

“你要把这其中感人的事情挖出来。”陈社长认真地叮嘱我。

到乌蒙山采访不久，恰逢母校山东寿光一中60年华诞，我应邀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于是我在几千人的诗歌朗诵大会上，上台即兴朗诵一首诗《行走，致敬！》：“我行走/行走在云贵高原/行走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区/行走在乌蒙山区腹地夜郎古城/行走在夜郎古城赤水河边鸡鸣三省/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七星关/看到了此景只应天上有

的织金洞/看到了彝族的火把节/看到了苗族的跳花坡/看到了国土人前线工作队 在深山狂奔/我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听到了赤水河日夜不息的流水声/听到了吱吱阿鲁湖奢香夫人和葛娘的传奇爱情/听到了王宏甲讲中国大道路和人民观/我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将云贵高原蓝天白云下透明的大气献给您我寿光一中的老师/我想将大山铤裙里的敬养牛献给您的老师/我想将公路草、柴胡、竹荪和古树茶寄给您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师/我想将一百里杜鹃花中怒放的马樱杜鹃献给您的老师/我想将一千只黑颈鹤的舞蹈献给您的老师/我想将从中央到地方决战贫困的故事讲给您我的老师/2020年我们会是全世界第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誓言/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誓言！”

乌蒙山，群山起伏，浩瀚如海。这座云贵高原上的主要山脉，因为长征和毛泽东主席的诗句“乌蒙磅礴走泥丸”而带上了浓厚的红色基因，因而享誉海内外。从2017年3月开始，我提着一个开会用过的深蓝色文件袋，走过10个深度贫困县。这其中我还和鲁院同学毛竹一块到铜仁、鸡鸣三省、金海湖采访，还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到基层调研，感受脱贫攻坚的力量。2020年7月，我们又和陈国栋主席的带领下再访乌蒙山，这时候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二批扶贫队员已完成交接。

2021年我已零零散散采访了几个地方，算起来，已是第四个年头。到咸宁去的时候，要走四五个小时，在赫章县，两个乡镇之间也要走两个半小时，时刻面临着晕车呕吐等现象。双坪乡彝族苗族居住地是最贫困的地方，海拔都在2100米以上，每次来赫章采访我都有耳鸣，忽然有一天我的右眼看不清东西了，回北京后治疗了3个月，才恢复了视力。

两次重点采访，乌蒙山10年的行走，成就了我的这部作品，这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也是一个写作者的机缘。在采访过程中，我遇上过贵州省委组织部从沿海发达地区引进来的有基层工作经验、作风扎实的干部，遇到过有博士学位、充实到最基层的干部，遇到过选拔特岗充实到农村任支部书记的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接触更多的是我们自然资源部抽调到基层的年轻有为的第一书记们。全国上下用尽一切办法，把消灭贫困作为一场人民战争，集中火力，决战小康，脱贫攻坚。2020年11月2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深度贫困的赫章县退出贫困县序列，乌蒙山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乡村振兴开始了。

从自然资源部同志处获悉，从1986年起，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成立专门扶贫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自然资源部（原地质部、国土资源部）1987年开始定点